

讨 论 稿

Working Paper

No.201401 2014 年 1 月

代际教育流动性的最新研究进展

杨娟*

摘要

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家庭背景对孩子受教育程度影响的研究也一直是美国经济学主流期刊的常客,归纳总结国内外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可以为我国政府和学者们在制定增加代际流动性的政策时提供决策参考。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影响的文献:一、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有多重要?二、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三、教育财政政策是否有助于减弱家庭背景的影响?

关键词: 家庭背景 儿童教育 父母教育水平 代际流动性

*杨娟,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100875)
Email: yangjuan@bnu.edu.cn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在十二届人大，以及出访俄罗斯、非洲等国家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梦的内容。其核心含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不难看出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可能是人民幸福的关键因素。79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很多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高考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目前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子女在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孩子却继续保持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舆论在社会中似乎形成一种共识。通过研究发达国家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及现状可以解释以及预测未来我国社会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缓解这种情况。

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近代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但该问题的研究在最近十几年有加强的趋势，而加强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可获得数据的质量越来越高（Black & Devereux, 2010）。目前国际上关于此类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研究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教育到底有多重要？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也就是“天生”还是“养育”决定了子女的教育成就和劳动力市场结果？这类研究试图通过各种数据和技术手段分离父母基因对子女的影响。第二类研究主要从父母的视角探讨孩子的发展与什么因素有关？父母的财富，父母的教养，所处的环境，兄弟姐妹，还是……？第三类研究从政策的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干预最有效？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目前关于家庭背景对孩子影响的研究进展。

一、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的影响

国际上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较高。Bjorklund&Salvanes (2011)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各国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相关系数一般在0.4-0.6之间，美国的代际相关性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东德的相关性最低，大约在0.25-0.30之间。此外代际相关性在这些年基本趋于稳定，变化不大。这意味着孩子的教育程度40%-60%与家庭背景有关。这么重要的影响迫使学者不得不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是由于父母聪明，孩子也聪明？还是由于学历较高的父母拥有较多的资源，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使得孩子学业表现较好。因此，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将基因的因素去除，研究父母的学历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因果关系。学者们目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研究此问题：固定效应法，领养（收）养法以及工具变量法。

固定效应法（又称双胞胎法）是研究教育程度不同的双胞胎母亲或父亲们对其后代教育程度的影响。该方法假定在双胞胎之间的基因是相同的，因此其子女之间的先天能力是固定的，子女间教育程度的差别可以解释为由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可以消除不可观察的因素（如能力）的影响，避免OLS估计中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国外有很多通过双胞胎数据估算的研究，如Behrman & Rosenzweig (2002)根据明尼苏达州同卵双胞胎登记数据发现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几乎没有正的影响，甚至产生负的影响。而对双胞胎父亲而言，父亲教育对子女的教育的影响依然是正且显著的，其系数与OLS系数相近。Antonovics & Goldberger (2005)对上述结果提出质疑，并通过改变学校和样本选择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他们发现，父亲的学历对子女的教育的影响总是积极并显著的，母亲的学历对子女的教育也有影响但低于父亲的影响大小。Bingley et. al (2009)利用丹麦数据对上述结果重新进行验证，得出与Behrman & Rosenzweig (2002)相似的结果。双胞胎法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将双胞胎之间的差别都归因于双胞胎之间教育程度的差别，从而影响了对孩子教育结果估计值的准确性。而实际上，即便是同卵双胞胎之间，在智商、行为习惯、思维模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假定双胞胎之间仅存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会低

估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

领养法则是以亲生子女为参照组,研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养子女的教育相对亲生子女的教育的影响程度的大小。由于领养的小孩与养父母的基因不同,所以可以把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关系视为“养育”或环境的影响(Plug, 2004, Björklund et. al, 2006)。如果养子女与养父母没有遗传关系,并且是被随机领养的,那么就能区别家庭环境和先天能力的影响。因此,观察到的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教育的任何联系,必定是由于父母任何一方的受教育程度或父母的其他(不可观察的)特征(如教育方式和对待教育的态度)造成的。由此可见,领养法不仅能够估计父母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而且还可估计任何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关的诸如家庭环境等因素对养子女的教育的影响。早期,Dearden et. al (1997)用英国的领养子女样本(小样本),研究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养子的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他们发现养父子的代际关系很高,甚至与亲父子的关系一样高,从而得出环境因素很重要的结论。Plug (2004)使用美国领养子女的数据重新研究了父母的教育与子女的教育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父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有正面影响,但是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并没有显著影响。Björklund et. al (2006),使用1962年到1966年出生于瑞典的领养子女行政数据得出了与Plug (2004)相同的结论,即养父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有正的影响,但养母对子女的影响不显著。虽然领养法可以排除基因因素,但此方法会产生较大的选择性偏差。领养父母对孩子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学历高、条件好的父母更有可能挑选一些“优质”的孩子,从而使估计值产生更大的偏差。此外领养样本数据库都比较小,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

工具变量法大多以外生变量——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工具,来估计教育的代际影响。Chevalier (2004)利用英国1957义务教育法改革研究父母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父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然而,文章的研究局限在于,英国的义务教育法变革是全国性的,并没有代表性的变化。Black et. al (2005a)以挪威义务教育法改革的时间作为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¹,他们发现父母的教育和子女教育之间弱相关。然而,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而言,强制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对其儿子的教育程度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由于在其用到的子女样本中,受到义务教育法改革的影响的父母的样本量较少,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向下偏差。Oreopoulos et. al (2006)²利用美国义务教育法关于最低受教育年限规定的变化和1960、1970和1980年大规模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父母的教育年限对子女留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任何一方的教育程度增加,都会减少子女的留级率,并且还发现,那些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子女更不可能在高中辍学。Piopiunik (2011)以德国义务教育改革³作为父母教育的外生变量,估计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其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也得出了与Black et. al (2005) (2006)相似的结论。简言之,以不同国家之间的义务教育法改革为工具进行的研究都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外生增加对其子女的教育有小的正面影响,而且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影响更为重要。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以教育的成本或学潮等外生变量为工具,研究教育的代际影响(Carnerio et. al., 2007, Maurin & McNally, 2008),他们均发现父母对不同年份出生的孩子的影响不同且父母的影响程度与以往用义务教育法改革为工具变量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别。

总体而言,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重要;然而,双胞胎法或领养法则认为父亲的教育更重要。研究父母教育与子女教育的因果关系的文献尚未得出确定性结论。原因有二:第一,文献的数据来源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第二,研究所用的识别方法不同。

¹挪威在1959年到1973年间各大城市逐步将义务教育年限由7年改成9年。

²为了避免讨论婚姻匹配问题,他们将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年限加总,研究父母教育程度的共同影响。

³1949年到1969年间,整个德国的义务教育年限从8年增加为9年。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识别方法的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和更准确地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性,一些文献对同一数据使用不同的识别方法进行方法间的比较研究。例如,Hægeland et. al (2010)分别采用两种识别方法:双胞胎法和领养法,利用挪威丰富的普查数据,来估计父母的教育与子女的教育的相关关系。不同识别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与大多数文献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双胞胎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表现没有影响,但是母亲的教育对养子女有正的影响,该系数的大小是亲生子女系数的三分之一。Holmlund et. al (2011)利用相同的瑞典数据,分别采用双胞胎法、领养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方法间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即使是在同一国家同一组群和同一制度下,不同的识别方法得到的结果也会不同。采用双胞胎法估计时,双胞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没有影响,而双胞胎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很小但却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 Behrman & Rosenzweig (2002)的研究结果类似。采用领养法估计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的估计系数小于之前的文献特别是 Sacerdote (2007)的研究结果。以瑞典的教育改革(与挪威相似)作为父母教育程度的工具,得出的结果与 Black et. al (2005b)一致:父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显著的影响,而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的影响小但显著。因此,他们得出父母的教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取决于识别方法,这表明,国家和组群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Holmlund et. al (2011)认为研究结论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识别方法所用的父母样本来自不同的教育分布,另一方面可能是不同的识别方法对于先天的能力的控制程度不同。该发现表明只有采用相同识别方法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才有可比较性。

研究中国家庭背景对后代教育的影响的文献也很多。Knight et. al (2009)使用CHIP-2002 农村样本数据,分析家庭的收入和父母的教育对后代初中辍学率和高中入学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的收入和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辍学率越小,而继续上高中的可能性则越大。Brown (2002)研究了父母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成绩(考试分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会为子女提供更高水平的与教育相关的物品和时间,并且父母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大的正的影响。Sato & Li (2007)用CHIP-2002 调查的农村样本数据,研究阶级背景(成分)对后代教育的影响。他们发现,即使控制父母的教育、家庭的财富和其他的家庭特征,地主或富农家庭(根据官方分类)的后代,可能比那些来自其它家庭背景的后代的教育程度更高。文东茅(2005)根据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数据,以毕业生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反映其家庭背景的参考指标,研究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校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要明显好于全国总体水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是农民子女的5倍,高校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刘精明(2006)利用全国人口第三、四、五次普查数据分析了1980—2000年间家庭背景因素对小学和初中入学机会的影响及其变迁,结果发现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不断上升,以父辈职业衡量的阶层地位的影响显著且维持不变。李春玲(2003, 2010)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和杨娟等(2013, 2014)也均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但由于OLS方法固有的局限性,无法得出父母与子女教育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数据的局限性,目前据我所知还没有学者用双胞胎法和领养法研究此问题。运用工具变量方法的研究也十分有限。Li et. al (2005)以学前主要食物(猪肉、大米和鸡蛋)的价格和工资的波动为工具,研究母亲对子女的照管时间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他们发现,母亲的教育和收入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正的影响。李云森和齐豪(2011)以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政策为工具变量,研究了教育代际相关性,他们发现母亲教育年限对子女是否接受后义务教育有正相关因果联系,而父亲教育年限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教育的代际传递机制

通过总结现有代际流动性的文献可知,目前关于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有多大尚未得出

统一结论，不同估计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差别较大，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探究可能的代际传递机制，即父母的教育如何传递给下一代(Lundborg et. al, 2011, Holmlund et. al, 2011)。我归纳了一下父母除了可能通过基因对下一代产生影响外，可能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子女的教育产生影响：提供的资源，婚姻的选择，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权衡以及文化传递。

(一) 资源约束

由于父母的教育抉择受到其财富的约束，父母需要权衡个人消费和子女的教育投资。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其收入相对也比较少，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会比较少，导致子女的教育程度较低。Becker & Tomes (1986) 构建了一个基本的代际流动性的理论模型解释父母财富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该理论模型被后来许多学者用经验数据检验。Kane(1994)以及Ellwood and Kane (2000)通过经验数据发现，贫困家庭，特别是黑人，面临着较强的财富约束，当大学学费降低时，会有更多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Carneiro& Heckman (2002) 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预算约束应该分为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通常意义上的财富约束或流动性约束属于短期约束，美国目前只有8%的儿童由于父母的短期信贷约束而上不起大学。更多的孩子面临的是长期约束。富裕家庭在孩子的整个教育阶段投入都比较充分，为孩子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Restuccia&Urrutia (2004) 构建了迭代教育选择模型，并通过宏观数据模拟，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推断贫困家庭早期教育投入的不足是造成孩子受教育年限差异的重要原因。杨娟和周青 (2013) 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2007年后家庭收入不再是制约农村儿童接受高中教育的重要原因，但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仍很显著。可能也反映了这种长期流动性限制的影响。

资源约束不仅包括财富以及其他可能提供的资源还包括父母分配给孩子的时间。有些学者从父母与孩子的共处时间角度，研究了父母教育程度与孩子教育获得的关系。理论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更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会增加家庭收入及对子女接受更多教育的期望，但会减少与子女相处的时间。但经验研究与我们的预期相反。Guryan et. al (2008)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与子女相处的时间也更长。Carneiro et. al (2007)也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与其子女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减少。Piopiunik(2011)发现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每周工作时间几乎相同，从而得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差异无法解释母亲的教育对其儿子教育的正面影响⁴。

(二) 婚配的选择

除受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收入外，选型婚配的影响（即高学历的人，其配偶的学历、收入或能力也更高）也可能影响父母的教育如何传递给下一代，但关于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差别较大。Behrman & Rosenzweig (2002)是最早使用双胞胎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当时的很多文献都发现了一个现象：母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子女可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其中原因有很多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亲教育水平高，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较高，而母亲的教育水平高则可以提高家庭教养水平，因为母亲相对父亲而言是比较“主内”的，孩子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中，更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是 Behrman & Rosenzweig (2002)把这个问题一分为二：母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能力的遗传和婚姻的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可能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结婚，进一步改善“基因”，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Carneiro et. al (200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其生育时间一般较晚，而且其配偶大多数都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会对其子女的教育产生积极影响。Black et. al (2005a)基于挪威义务教育改革的研究发现不存在选型婚配影响，而

⁴与之相反，Carneiro et. al (2007)利用与母亲教育相关的其他外生变量研究发现，在美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在小孩出生那年的工作时间比受教育年限更低的母亲更长。

Piopiunik(2011)基于德国的微观普查数据却发现在接受基础教育水平的女性间并不存在选型婚配效应(接受九年教育的女性的配偶的教育水平并不比只受八年教育的女性的配偶高),尽管从全社会整体来看,存在很显著的选型婚配效应(详见 Ermisch et. al (2006))。

(三) 数量和质量的偏好替代

数量和质量的偏好替代是另一个可能解释母亲的教育对其子女教育影响的传递机制,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可能会选择生育更少的小孩,并对每个小孩投入更多资源。理论认为,如果父母在子女的数量和每个子女的投入(由于预算约束)上存在数量和质量的权衡的话,那么家庭规模对子女的教育有重要影响(Becker & Lewis, 1973; Becker & Tomes, 197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子女越少,母亲就能对每个小孩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例如,可以陪同子女一起参加文化活动或指导作业和学校的相关活动。Jones & Tertilt (2009)确实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偏好生育更少小孩。Piopiunik(2011)虽然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会生育更少子女的事实,但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无法直接控制家庭规模,因此尚不确定这一传递机制是否可以解释教育的代际传递。关于子女的数量对子女质量的因果影响的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例如, Rosenzweig & Wolpin (1980)用多胎作为印度家庭规模增长的外生变量,发现家庭规模更大的家庭的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另一方面, Angrist et al. (2005)对于以色列非独生子女(两个以上子女)家庭,也用多胎和同性别子女虚拟变量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第二胎和更多胎子女的出生带来的家庭规模的外生增长似乎对头胎和二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影响。同样, Black et al. (2005b)使用挪威的行政数据和多胎工具变量进行研究,也没有发现任何对子女教育或收入的影响。Conley (2004)用美国 1980-1990 年的普查数据,估计家庭规模对私立学校就读率和小孩辍学的概率的影响。为了识别家庭规模的因果影响,他认为与拥有一儿一女的父母相比,拥有同样性别孩子的父母更可能生育第三胎。Conley 以此为工具发现家庭规模对私立学校就读率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对小孩的辍学率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当他分别对第一胎和非第一胎小孩进行研究时,发现家庭规模只对非第一胎小孩有显著影响。然而,受数据所限,根据普查数据的结构,作者无法得知那些不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人的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是一个由父母选择的内生变量,可能与父母其他不可观察(影响子女的成就)的特征有关。除了内生性问题,文献研究时还面临重大的数据局限问题。大多数文献普遍都没有大量代表性数据,不能研究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感兴趣的经济问题。此外,关于出生顺序的信息缺乏意味着出生顺序与家庭规模的影响相互混淆。

(四) 文化传递

Haveman & Wolfe (1995)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推断父母的学历是孩子教育获得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遗传更优质的基因,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还可能是父母的教育方法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Oreopoulos & Salvanes (2011)利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对子女教育更有耐心。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曾提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意识到教育带来的各种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的好处,从而重视子女的教育并对其施压,使其接受更多教育。” Piopiunik(2011)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更重视其子女的学习成绩,也更相信勤奋好学对子女很重要,而这种重视会促使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或提高其学习成绩。

当然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但总体而言对于父母到底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我们知道的还比较少,可能是未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一个方向。

三、公共教育政策的效果分析

上一部分我们分析了可能的父母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途径,接下来我们试图总结现有文献中关于教育财政政策对减缓代际流动性的一些结果。公共政策可能影响不同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投资,也可能改变不同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为了提高弱势群体子女的教育程度,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或改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现有文献中关于教育政策效果分析的很多,但关于教育财政影响的讨论较少。由于各国教育体制差别较大,单纯教育政策的影响对我国的借鉴有限,而教育经费的投入机制,各国大体相似。因此关于教育投入对学生学业以及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对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的设计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将从公共教育经费增加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投入更有效二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教育投入是否有效

关于这一问题研究,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学者认为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降低辍学率,缩小不同人种之间的教育和收入差距。例如 Hanushek (1997) 认为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将会增加学校资源,这对于提高儿童的学习成绩或降低辍学率有重要的影响,对黑人的影响更显著。Card and Krueger(1992) 发现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使黑人学校的质量显著提高,进而缩小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更多的学者的研究却发现白人或富裕家庭的孩子会更多的受益于政府教育经费的增加,因此增加教育投入对缓解代际流动性的作用非常有限。Cascio, Gordon & Reber (2011) 对美国最穷的南部地区Title 1⁵实施效果的研究却发现Title 1 确实增加了学校的预算支出,但仅减少了白人孩子的高中辍学率,对黑人孩子没有影响。Carasso, Reynolds & Steuerle (2008)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支出进一步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上所产生的不平等,美国的教育经费中仅有1/4 用于中低收入家庭。Corak (2013) 认为美国政府教育投资的分配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特权阶层的孩子受益更多。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经费的分配中,高等教育占比过高。高等教育的生均财政经费是小学生均财政经费的3 倍,在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占比最高,这样会使中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教育经费。杨娟等(2014)对我国教育经费增加后的效果分析时发现,增加教育经费确实有助于贫困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但财政经费的作用在2007 年开始减弱。

(二) 如何分配教育经费更有效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哪一个阶段的教育投入更有效;二是如何投入更有效。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家庭的孩子不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上不起大学,而是不愿意上大学或学习能力较差没办法上大学。减少大学的学生资助或增加贫困儿童的助学金,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小(Belot, et.al, 2007, Leuven,et.al., 2010),增加早期教育投入对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大。Cunha et al (2007)认为早期教育是今后学校技能获得的一个补充,有助于激发学生获得更多地人力资本,因此对于早期教育投入的回报大于后期教育的投入。Carneiro& Heckman (2002)也验证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程度低于富裕家庭孩子的教育程度,主要是贫困家庭在孩子教育的早期投入较少,导致孩子今后的学习兴趣不高,不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Restuccia&Urrutia (2004)通过挖掘不同收入家庭孩子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根源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贫困家庭由于受预算约束限制,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少,使得其接收的教育质量较差,导致贫困家庭孩子的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进而产生了较大的收入差距以及较高的代际收入持续性。但 Restuccia&Urrutia 所指的早期教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前教育,而

⁵Title 1 项目是美国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而设立的一个联邦政府教育经费支持项目。

是泛指学生的基础教育阶段。

关于如何投入的问题，学者们主要分析直接投入学校更有效，还是投入家庭更有效。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最早追溯到 1955 年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他认为通过给学生发放教育券，让学生自主的选择学校，可以增加学校间的竞争，提高学校质量。这样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比直接补助学校更有效。Jencks（1972）将弗里德曼提出的人人等额面值的教育券近一步发展为只补给贫困儿童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教育券。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教育机会的平等。布什就职后，开始在一些城市实施了教育券，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教育券的实施受到了公立学校和教育工会的抵制，使得教育券法案在很多州没有通过议会的表决，最终没有实施。在美国只有一个州的两个城市实施了教育券。为了避免竞争机制引入所造成的阻力，同时鼓励更多贫困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近几年南美洲推出了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该项目的分配原理与教育券相同，同样是将教育经费分配给家庭和学生而不是学校，但具体的实施过程不同。该项目根据家庭收入筛选一部分贫困儿童作为资助目标，根据这些儿童的在校天数，支付给家长一定的现金补偿，鼓励贫困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同时，没有引入学校的竞争机制。南美洲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根据自己的教育特点实施了相应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均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但对贫困儿童的筛选存在一定的困难，容易产生寻租。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不难看出，直接分配给家庭的教育经费投入模式比直接投到学校更有效，但实施起来成本较高，阻力较大。

小结

通过对国际上关于教育代际流动性最新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不仅体现在基因的遗传上，家庭环境的养育也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孩子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了孩子很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使得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产生较大的差距，导致贫困家庭的孩子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公共教育经费在促进教育公平，减缓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非常有限。为了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需合理分配教育经费在不同阶段的比例，以及相应的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 Almond, D. & J. Currie. 2011.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before Age Five".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d. by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Elsevier, vol. 4: 1315–1486.
- Angrist, J., V. Lavy & A. Schlosser (2005): "New Evidence o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835.
- Antonovics, K. L. & A. S. Goldberger. 2005. "Do Educated Women Make Bad Mothers? Twin Studi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5): 1738-1744.
- Becker, G.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BER: Chicago.
- Becker, G. & H. Lewis.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S279–S288.
- Becker, G. & N. Tomes. 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S143–S162.
- Becker, G. & N. Tomes. 1986.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3, pt 2), S1-S39.

- Behrman J. R. & M. R. Rosenzweig. 2002. "Does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 323-334.
- Bingley, P., K. Christensen & V. M. Jensen. 2009. "Parental School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Twin Parents". The D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5.
- Björklund, A. & K. G. Salvanes. 2011. "Educat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ed. by E. Hanushek, S. Machin, and L. Woessmann, Elsevier, vol. 3: 201–247.
- Björklund, A. & M. Lindahl & E. Plug. 2006. "The Origi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ociations: Lessons from Swedish Adoption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3): 999-1028.
- Black, S. E. & P. J. Devereux. 2011.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d. by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Elsevier, vol. 4: 1487–1541.
- Black, S., P. Devereux & K. Salvanes. 2005a. "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 437-449.
- Black, S., P. Devereux & K. Salvanes. 2005b. "The More the Merrier? The Effect of Family Size and Birth Order on Children's Edu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669–700.
- Brown, P. H. & A. Park. 2002. "Education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1(6): 523-541.
- Cameron, S. V. & J. J. Heckman. 1998. "Life cycle schooling and dynamic selection bias: Models and evidence for five cohorts of American ma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262-333.
- Carneiro, P., C. Meghir & M. Pary. 2007. "Maternal Education, Home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3072.
- Chevalier, A.. 2004.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hild's Education: A Natural Experimen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IZA Discussion Papers 1153.
- Chevalier, A. & G. Lanot. 2002. "The relative effect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Education Economics*, 10: 165-182.
- Cinnirella F. & M. Piopiunik & J. Winter. 2010. "Why Does Height Matter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German Pre-Teen Children,"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2983, forthcoming in: *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 Coleman, James. S. et al. 199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US GPO: Washington DC.
- Conley, D.. 2004. "What Is the "Tru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and Birth Order on Educat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es from Exogenous Variation in Fertility". Mimeo.
- Cunha F. & J. Heckman. 2008. "Formulating, Identifying and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738–782.
- Currie, J.. 2009.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Socioeconomic Status, Poor Health in Childhood,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7(1):87-122.
- Dearden, L. & S. Machin & H. Reed. 1997.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7: 47-66.
- Ermisch, J., M. Francesconi & T. Siedler. 2006.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Mobility and Assortative Mating". *Economic Journal*, 116: 659–679.
- Guryan, J., E. Hurst & M. Kearney. 2008.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Time with Children".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 23–46.
- Hægeland, T., L. J. Kirkebøen, O. Raaum & K. G. Salvanes. 2010. “Why Children of College Graduates Outperform their Schoolmates: A Study of Cousins and Adoptees”.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 Holmlund, H., M. Lindahl & E. Plug. 2011. “The Causal Effect of Parent’s Schooling on Children’s Schooling: A Comparison of Estimation Method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9(3): 615-651.
- Jones, L. & M. Tertilt. 200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6-1960”. In *Frontiers of Family Economics*, ed. by P. Rupert, Emerald Group, vol. 1, chap. 5: 165–230.
- Knight, J. & Shi Li & Qiheng Deng. 2009. “Education and the poverty trap in rural China: setting the trap”.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7(4): 311-332.
- Knight, J. & T. Sicular & Ximing Yue. 2011.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mensi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IBC Centre for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s 201113.
- Lee, J.. “Children and Household Education Decisions: An Asian Instrument”. Working Paper, 2003.
- Li, Hongbin & Xianguo Yao & Junsen Zhang & Li-An Zhou. 2005. “Parental childca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37(18): 2067-2076.
- Lundborg, P. & M. Nordin & D. O. Rooth. 2011.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Exploring the Role of Skills and Health Using Data on Adoptees and Twin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6099.
- Maurin, E. & S. McNally. 2008. “Vive la Revolution! Long-term Educational Returns of 1968 to Angry Stude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 1-33.
- Oreopoulos, P., M. E. Page & A. H. Stevens. 2006. “Does Human Capital Transfer from Parent to Child?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4): 729-760.
- Oreopoulos, P. & K. Salvanes. 2011. “Priceless: The Nonpecuniary Benefits of School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 159–184.
- Piopiunik, M.. 201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and Mediating Channels: Evidence from Compulsory Schooling Reforms in Germany”.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Working paper NO. 107.
- Pischke, J.-S. & T. von Wachter. 2008. “Zero Returns to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Germany: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 592–598.
- Plug, E.. 2004.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Mother’s Schooling on Children’s Schooling Using a Sample of Adopte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 358-368.
- Rosenzweig, M. & K. Wolpin. 1980. “Testing the Quantity-Quality Fertility Model: The Use of Twin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Econometrica*, 48, 227–240.
- Sacerdote, B.. 2007. “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Adopte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1): 119-157.
- Sato, Hiroshi & Shi Li. 2007. “Class origin, family cul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2642.